

新九叶集

骆家金重 主编



Neuf
Nouvelles
Feuill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新九叶集
XIN JIUYE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九叶集 / 骆家, 金重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495-4153-9

I. ①新… II. ①骆…②金…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294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30 千字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册 定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序一 | 巴别塔的女儿

王家新

在中国新诗史上，我最认同的是 20 世纪 40 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传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里，这个“诗人群”，无论是“师长一代”（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前辈诗人），还是新锐的“学生一代”（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不仅坚守了“五四”新诗的传统，还以其对“现代性”的锐意追求，把中国新诗推向了一个新的更令人瞩目、也更富有生机的阶段。纵观百年新诗，“西南联大诗人群”不仅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奇观”，而且他们对此后的新诗发展——尤其是自《九叶集》出版以来，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的确，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氛围中推出的《九叶集》（1981），堪称新诗史上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它不仅发现了九位“被埋葬”的优秀诗人，而且将那个年代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艺术成就令人惊异地展现出来。当然，在《九叶集》刚出版的

那些年月，人们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那一代诗人的追求和贡献的，而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中国新诗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把他们的翻译包括进来。《九叶集》中的穆旦、陈敬容、郑敏、袁可嘉等人，以及未收入《九叶集》、但同样是西南联大出身的王佐良，不仅是诗人，还都是各有成就的优秀译者。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求索和建设，而且合力塑造了“诗人作为译者”这一“现代传统”。他们富有创造性的译作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和读者，构成了百年新诗最有价值和光彩的一部分，成为留给我们的重要资源和遗产。

我一再感到，这一传统——“诗人作为译者”——的重建，不仅对于诗人们自己的创作十分有益，而且对于继续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也至关重要。

而这一传统的重建，在我看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主要就是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的王佐良先生所推进和承担的。可以说，他堪称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作为一个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诗人，王佐良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完全转向了诗歌翻译和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而在“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早年的爱”，并以其诗人的敏感和责任感，延续和拓展着“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现代性”的追求。他在80年代初期

对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美国“新超现实主义”或“深度意象”诗人的发现性译介，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年轻诗人，在诗坛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他后来对奥登等诗人的翻译，则带着他的全部敏感和多年的译诗经验，透出了一种高超的技艺和语言功力，真正体现了卞之琳先生所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不仅如此，王佐良先生还肩起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对中国新诗“诗人译诗”这一传统进行回顾、总结和阐发。他的诗歌观、翻译观，他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他对语言的特殊关注，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重新塑造，都一再地激励和启迪着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代诗人和译者无不受惠于王佐良先生。

正因为如此，我和许多中国诗人一样，在那时会常常把目光投向“北外”，因为那里有这样一位为我们所高度认同的诗歌前辈和翻译大家。我们不仅关注王佐良先生自己的著译，还关注北外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很多中国诗人都订阅有这份杂志）。我就是在这种“认同感”的作用下，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不仅关注北外的诗歌活动和学生文学社团，也先后认识了像王伟庆（少况）、李笠、树才、金重、高兴、黄康益、骆家、李金佳、姜山等年轻的北外诗人和译者们。

的确，我对他们感到亲近，不仅是因为他们热情，

满怀着 80 年代特有的诗歌理想，还在于他们大都是王佐良先生的学生；不仅在于他们投身于诗歌，还在于在他们身上都“携带着一个译者”。我们在一起可以谈论我们所热爱或感兴趣的那些诗人，如夏尔，如特朗斯特罗姆，如安妮·塞克斯顿。诗人多多当年就很看重王伟庆、金重、树才的翻译，在笔记本上抄满了他们的译作。我自己最愿接近的，也正是这一类诗人兼译者的年轻同道。或者用策兰的一个说法，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从两个杯子喝酒”的人。我难忘和他们在一起日夜谈诗、日夜从两个杯子“畅饮”的那些时光！

也不知为什么，我会经常把诗和诗人与学外语联系在一起，比如穆旦等西南联大那一批年轻诗人，大都是“外语系出身”，卞之琳、冯至、戴望舒，也都是“外语系出身”，台湾地区的一些诗人如余光中、杨牧和后来的陈黎、陈育虹等人，也都是“外语系出身”。我自己曾一再后悔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而不是外语系，那就只得靠“自学”了。我这样讲，并非因为对我们自己的母语“没有感情”，而是正如我翻译的英籍德语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所说：“语言发现它的青春源泉，在另一种语言中。”这些，我自己在阅读、翻译和写作的过程中都一再地体会到了。因此，我一直对外语学院怀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在我看来，比起中文系，那里更有可能成为一个“诗的摇篮”（当然，最好是有王佐良、叶

公超这样的老师！王佐良且不说，叶公超当年在清华外语系任教，就带出了卞之琳、赵萝蕤这样的学生诗人译者）。两三年前北外的学生文学社团采访我，我还称他们是“巴别塔的儿女”（这里借用了乔治·斯坦纳的一个说法：“我们的文学是巴别塔的儿女”）。北外，作为一个拥有那么多外语学科的学校，它本来就是一座“诗歌巴别塔”，从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如李笠（瑞典语），树才、李金佳（法语），少况、金重（英语），高兴（罗马尼亚语），骆家（俄语），就是一个例证（其实，从北外出来的诗人译者还有现居澳门的姚风，他学的是葡萄牙语）。而我之所以用“巴别塔的儿女”做这篇序文的题目，也在于其更普遍层面上的意义：所谓“全球化”时代也好，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时代也好，都是穿越巴别塔的时代；在现在，在将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我们也只有在穿越“巴别塔语言变乱”中才能练就一种更敏锐的诗歌听力。

这些年来，虽然王佐良先生早已离去，当年的年轻诗友也已星散，但北外的文脉还在，诗脉还在。我任教的人大和北外挨得很近，我也和北外的李雪涛教授，阿多尼斯、达维什的译者薛庆国教授多有交流。北外聘请著名汉学家、诗人顾彬做了特聘教授后，他在北外也组办了许多诗歌活动（包括去年他组办的“王家新和他的译者们”多语朗诵对话会）。诗人翻译家汪剑钊教授调入

北外后，北外的诗歌气氛更浓厚了。我只是希望在北外能再次涌现更多像收入本集的诗人一样的年轻诗人，重现 20 世纪 80 年代它曾有的诗歌荣光，或者说，再次成为一座“诗歌巴别塔”！

就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他们中的不少都以翻译和创作成名，如李笠、树才、高兴等，在诗坛和译坛都有着广泛影响；有的仍在“潜行”，但已展现出他们的潜力；有的厚积薄发，如骆家，近年的诗和翻译都让人乐见；有的远离故国，但仍孜孜于诗，和他的缪斯守在一起，如美国圣地亚哥“幸存者村庄”里的金重。这些年，北大、复旦和我的母校武汉大学诗友校友，都纷纷打出了各自诗派的招牌，或是出版有各种校园诗选。我也衷心希望已分散在各地的“北外诗人”们能重新聚集起来，因此在与他们聚会时提出了出书的建议。我倒没有直接称呼他们为“新九叶诗人”，只是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在我看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无论从文脉上看，还是从他们的写作本身所体现的独立、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视野和精神上看，他们也都有充分的条件赓续“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个传统——当然，传统的赓续、拓展和刷新不单是靠哪几个人，而是靠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那就让我们都为之努力吧。

七八年前，我曾写有一文，专门介绍和评论王佐良

先生翻译的洛厄尔的《渔网》一诗。它并未收在王佐良先生的译著中，我只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见到。但是，仅仅这一首译诗，已足以让人难忘了。它不仅展现了洛厄尔的优异诗质，也透出了王佐良先生自己的敏锐眼光和精湛、高超的翻译诗艺。读他这首极富创造性的译作，并对照原文，我不能不惊异译诗艺术已被推向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因为骆家在其《编后记》中全文引用了该译文，我就不再引用了。我最后想说的是：王佐良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的这首译作，几乎也就是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光辉写照。他们满怀着理想和责任，把自己献给“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在写诗和译诗中度过了一生。他们也许“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但他们撒下的渔网并没有落空。他们不仅给中国新诗和语言文化做出了最可宝贵的奉献，他们也带出了、滋养了新的一代（这本《新九叶集》就是证明）。他们留下的遗产，正如那磨损的挂在墙上的渔网，难以辨认而又令人起敬。它已被牢牢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之上。实际上，它也不需要别的“未来”；它自身就在昭示着一种语言和诗歌的光辉的未来。

2017.9.29 人大林园

序二 | 我这根火柴成了灰， 点燃的诗灯却长明

——致敬神奇的 20 世纪 80 年代

张桦

这事儿很有些神奇，本身就像一首诗。

九个相差十二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男生，既不同系，又不同级——相隔十一个年级：79 级—90 级——却因为诗歌而相识相知，走到一起。

毕业后他们凭借自己学到的语言技能，走进不同的世界。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如法语 83 级的树才，分到国家进出口公司当项目经理，号称挣钱多得发傻，可就这么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几年后却被他换成了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坐冷板凳，只因他想写诗，译诗，研究诗。不仅他，其他八位，二十多年来也都大同小异，他们最终被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王家新教授发现提携，仿效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著名的“九叶诗派”命名为“新九叶”。

“新九叶”诗作合集要付梓了，辗转找到我，称我为“老师”，令我惭愧不已。他们记得我，按说原因很

简单：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确实当过北外的老师，鼓动同学们成立了“尝试”文学社，当顾问，出期刊，请作家们来校讲座，向报刊推荐学生习作——居然在一年多时间里，从《人民文学》到《北京晚报》，发表了上百篇作品。一时间，人们刮目相看：北外文学社兵强马壮，风风火火，而“新九叶”中好几位正是当年文学社的骨干。

但是不简单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这据说点燃了他们心中燭火的火柴，早已在碌碌无为中成了灰，他们这九盏诗灯却依然闪烁在文学星空，照亮并温暖着我已不年轻的心。

为什么会如此？他们有什么魔法，从青葱年华倏忽间穿越到了今天，出现在我面前，依然是九茎新绿、九缕清光、九瓣心香？

探究这神奇的原因，我首先想到，必须要归结于那个神奇的年代。

是的，我说的就是 80 年代。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远没有当今人的钱包满满，但是人人幸福满满希望满满信心满满。我记得，我请过几十位作家到北外来给文学社做讲座，他们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天下谁人不识君”，各种各样桂冠戴了一脑袋，但已在文坛上才华逼人、声名鹊起。请陈建功时，他说，要么车接车送，要么就什么别管，结果是他自己

骑车来了，我唯一的款待，是在筒子楼烟熏火燎的走廊里，为他准备了三个菜的“感谢宴”。到请莫言时，连这顿饭都免了，我只负责到公共汽车站接送。请北岛时，原来安排的三百人的大教室突然变得拥挤不堪，临时改到一千二百多人的大礼堂依然座无虚席。请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两个作家班来校座谈时，就更富戏剧性了，我只对两位班长说：人人都说北外女生漂亮，你们不想见识见识吗？——这擦了“色诱”的边吧！二十多位得过全国文学奖的名作家结队走进北外，这事儿，甚至惊动了北外当时的院长王福祥，他马上命令学校招待所开席三桌，全程亲自作陪，给了我和文学社一个很大的面子。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我记得，我夹着一叠一叠的学生习作，去过很多报刊编辑部。我这个“推销员”与编辑们并无深交，最多只是一支烟一杯水的交情，而且往往是他们递给我。可我从未受过冷眼怠慢，这些青涩却纯真的作品得到他们的青睐，后来还有刊物定期上门来征稿。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我记得，文学社自办的是双月刊，每次临近出刊，都是十几位同学到学生会搬来大捆的新闻纸，架起油印机（“90后”们肯定没见过那种老古董），贴上熬夜刻好的蜡纸，抄起油滚子，一页一滚地让习作呱呱坠地，每次最少要印三百份——文学社

有三百个社员，现如今到哪儿去寻找如此庞大的文学社团（多年后我惊异地发现一位女生仅仅因为一位文学社男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就嫁给了他，禁不住问其感受，她淡淡回我：上当受骗了呗）。

很多年来我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神奇，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上，余韵绵长！尤其是在我商海挣扎游泳的艰辛过程中，那些有形无形的帮助和鼓励，支撑我全身而退，否则我不是呛水溺亡，就是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当我对老友高伐林（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谈起“新九叶”这个神奇的故事，并将奥秘归之于那个神奇的年代时，这位老友却没有轻易苟同我的看法：归功于80年代？我们都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啊，除了“90后”“00后”这些晚出生者，谁没有经历过80年代？为什么大多数人如你所说“碌碌无为”甚至火柴燃尽，却没有“新九叶”这样的坚守、这样的追求？

这让我陷入沉思。是啊，80年代那种百废待兴、狂飙突进的氛围，无疑熏陶、激励了包括“新九叶”在内的所有人。但是后来呢，三十多年，大家都经历了时代的颠簸、生活的磕碰，“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语），而他们却不改初衷。更深刻的原因，恐怕还得要从他们灵魂深处寻找：他们内心本就蕴藏了这样的能量、具备了这样的潜力，才能在80年代被一支火柴点燃之后，与那个年代呼应共振；而且

在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之后，他们仍然能激情燃烧，长明至今。

但我还是要致敬 80 年代。“新九叶”是 80 年代孕育的骄子，他们也是构成 80 年代的杰出一员（不，九员），他们更是、更应该是我们民族超越 80 年代、贯串于所有时代的宝贵元素和精神结晶！

“新九叶”的诗歌造诣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要说，读这些诗，让我回到了那个神奇的年代，让我惊悟那种纯洁的感受和沉静的思索，与当今世间的浮躁、喧嚣，形成何等巨大的落差；让我重新唤醒并梳理许多已经麻木的思绪，关于母亲、爱人、孩子、理想……“新九叶”这个群体，三十年前他们是我的学生，而今天，我向他们学习。对这九片在阳光下绿油油的诗叶，我衷心地祝愿他们继续跋涉在诗的路上。

2017.8 纽约近郊家中

序三 | 自由的困境

——《新九叶集》序

高尚

命名：“新九叶”

伟庆来兰州出差与我小聚时，谈及骆家、金重受诸位诗友之托，主编一本北外当代诗人诗选，且名字也已经取好：《新九叶集》。这令我瞬间开心！因其中大多诗人（包括伟庆本人）都是故交，且多为我所熟悉和喜欢的翻译家。我俩立刻电话联系到多年未见的朋友骆家，向他在南方的炎热酷暑中挥汗编书致敬，我同时表明希望自己是这本诗集的第一个读者。骆家仁厚，热诚地允诺了。

“新九叶”这名字，细思十分诡异，一定出自一个吊诡的头脑。经向树才、伟庆、骆家诸友求证，始知它的议定与命名与王家新兄有关。他去美国顺道到金重那儿，俩人在小聚闲聊中，这一诗集选题连同它的名字便无中生有了。想想时下生态，深感此举已足具《过故人庄》

式的超拔清新了。

说“新九叶”这名字诡异，是因这“新”会强烈引发对“旧”的联想和记忆，其间弥散着一层走光的暧昧。说它“走光”，是因为这暧昧中油然升起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九叶诗人”。

“九叶诗人”中，我有幸认识唐祈和袁可嘉二位前辈。1979年，我刚进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大）校园，唐祈先生作为在校老师，不问出处也不加区别地为一批热爱诗歌的学子办起了诗歌讲堂。他用一本本即时油印成册、散发浓郁油墨气息的汉译西方现代派诗歌做教材，用庞德、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叶芝、布勒东、艾吕雅给大家做诗歌启蒙，其间偶尔辅之以他所亲历的中国现代诗歌。他是一位文气、儒雅的诗人，又是一位热忱、执着的诗歌教父。我时常会这样想：那个时代，在大学这块园子里，每个爱诗的学子最当得遇的，当是唐祈这样的先生。

1988年初至1989年底，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修习文化人类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期间，因兼在外国文学所图书馆做勤杂，又得遇袁可嘉先生。当他得知我是唐祈先生学生时，颇有几分愉悦；再当我告知他当年唐先生给我们讲叶芝那几首名作，采用的均是他的译文时，他边用手摸着自己头发稀疏、熠熠生辉的脑门，边爽声哈哈大笑，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他告诉我，他对叶芝